

彻底揭露陶鑄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罪行

(批判资料,仅供参考)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
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四月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

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目 录

中央首长论陶铸	(1)
(一)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5)
(二)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学说,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9)
(三)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3)
(四)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8)
(五)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推行资本主义复辟	(26)
(六)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投降主义路线	(33)
(七)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44)
(八)推行修正主义新闻路线	(53)
(九)在交际、接待部门复辟资本主义	(68)
(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推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74)
(十一)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破坏四清运动	(78)
(十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代表人物	(90)
(十三)自我吹嘘,专横拔扈,搞独立王国	(114)

附录:

1. 陶铸在广东省第一次学生代表会议上的总结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摘录)	(118)
2. 陶铸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在恳谈会上的讲话	(122)
3. 陶铸在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九月)	(128)
4. 陶铸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	(133)
5. 陶铸关于中央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部分) (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下午三时)	(143)
6. 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问题时的实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148)
7. 文化大革命以来陶铸言论目录	(161)

中央首长论陶铸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元月八日在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会上说：“陶铸问题是严重的，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党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是可以的。”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了就解决了。”

（一）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陶铸的错误之一，就是他在接见中南地区的一次会上说，除了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外，都可以怀疑。表面上看，好象他说的也对，尊重毛主席，实际上是孤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句话是不许可的，不能绝对化，领导干部还要一分为二，还是有好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周总理对工交口的讲话）

“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它是有关联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同志插话：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反映的情况是很好的，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同志在中央文革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

“有一小撮人搞阴谋诡计，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被揭露了，例如：街上贴“打倒陶铸！”，我给武汉××造反团谈话时说，陶铸在刘、邓路线推行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中有的同志揭发陶铸执行刘、邓路线这件事，揭穿这件事。中央、毛主席是知道他执行刘、邓路线的，想挽救他，叫他过来。可是，十一中全会后，没有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还是继续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和王任重领导着中南局，出现了许多事情，是典型的反动事件，在武汉逮捕了大批群众。相当大规模地逮捕革命群众，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过。”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陈伯达同志在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陶铸么？在刘、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是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他的屁股就是坐在那一边。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在什么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在要把人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上；在什么所谓恢复党、团组织这样的问题上，就是执行的刘、邓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王力同志在新华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二）陶铸“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路线的批判、千方百计地压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现在地方上许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把矛盾上交，陶铸给长沙打电话，要三千人来北京，有的买不上票，就打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周总理在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而在刘、邓被揭露了，刘、邓路线被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站了，陶铸成了继续执行刘、邓路线的人，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路线的批判，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个批判，继续压制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起来了，他更沉不住气了，千方百计地压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刚起来的时候，这种形势本来是好得很嘛！可是他觉得不得了，一定要把它压下去。凡是领导他的单位，凡是过问他的单位，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够得到贯彻，就要继续执行他的那一套。他的那一套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货色呢？这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红旗》杂志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经变成一个全国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的时候，这个陶铸，他还是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这个词，他也反对。”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王力同志在新华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三）陶铸“耍两面派”，搞“特务活动”。

“从新的中央宣传部，陶铸同志接管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指伪造的六六年国庆节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只是其中一张。刚才有个同志递了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子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在他所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的？（众：反党性质！）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这两个传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你们不肯受蒙骗，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能够识别它，认识这种……（江青同志插话：恶劣的！）极端恶劣的手法，揭发这种阴谋，揭发这种极端卑劣的手法，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这是我们党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我们革命的传统，实事求是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尊重事实的传统。有人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想把这个传统抛弃掉，想篡改这个传统，这是很清楚的嘛！还有电影（戚本禹同志插话：还有些电影，我把情况说一说吧！主席接见几次，拍了一些电影，这些电影在审查时，发现他们在拍的当中，突出刘、邓，把刘少奇、邓小平的画面搞得很大，形象搞得很大。当时，江青同志，伯达同志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才不得已作了修改。）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华社斗争是很激烈的。在一切文艺界斗争是很激烈的。现在还是很激烈的，你们挺身而出，来揭露这些事实，我们感谢你们！至少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识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样搞阴谋。”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陈伯达同志在新华社的讲话）

“关于陶铸，我讲几句话。伯达同志讲了，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推广刘、邓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面前，在毛主席面前都几次帮助他，批评他，他都采取两面派，有时候很‘左’，实际是形‘左’实右。”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康生同志在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我们对陶铸善意批评，他要两面派，他伪造照片。那次会议是康生同志主持的。他对熊复下命令，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就把康老旁边的陈毅同志的头弄掉，换上邓小平的头，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特务活动！……他们还搞了一张把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拼凑在一起的照片，已经发行到了全国。（康生同志插话：已经传到外国去了！）陶铸、熊复就是这样干的，还有一个人，可能还有。唯独陶铸和熊复这样干的。第三次接见的电影还是违背十一中全会精神

的,都是陶铸干出来的,肖望东也照办。……”。

“他镇压我们小组,和王任重勾结在一起。”

“刘志坚是第一线的。去年可捞了一点资本,从此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不过,很隐蔽,但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开始是王任重,后是他,接着是陶铸。”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四)“陶铸是拥护高岗的”

“建国以后,我们党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同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一次是同彭、黄、张、周的斗争,一次是彭、陆、罗、杨的斗争。陶铸在高、饶问题上犯过错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检查,第一次是没有过关的,第二次勉强过关。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也好,他们怎么对待毛主席,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周扬的堂兄弟周立波写了一篇诬蔑毛主席的《毛主席到韶山》的大毒草,就登在《羊城晚报》上,并且还第二次发表。再比如,去年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中央立即通知全国各地不准登载,但隔两个礼拜,广州报纸全篇转载了。他是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王任重那一套就是陶铸那一套。姚文元文章全国各省都登,就是陶铸领导的湖南省委没有登。因此,我们宣布陶铸的问题不是仓促的。……当时陶铸是拥护高岗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康生同志在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五)陶铸“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革命过不了”。

“我们想帮助他,帮助陶铸同志,但他没有转过来。他的世界观,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可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批评他,在常委批评他,但没有能触及他的灵魂。是否帮助他不够呢?他自己认为是这样,我们认为是认真帮助过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就批评过他,希望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当然我们说得婉转些。十一中全会后,他继续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公开摊牌好,不然,我就不安了。’他说是这么说,做还是那么做,他仍然照他的轨道前进。街上这么多大字报,‘打倒陶铸!’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过错,是不是我陈伯达的过错?后来他自己写过一封信,有一句话——‘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上去。我们帮助也帮不上。是否除陶铸以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呢?恐怕还有个把吧!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但有的病不能治了,的确不能治了。陶铸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表演,这几个月的确够瞧的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陈伯达同志在中央首长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当然陶铸在大街上有那么多标语,有群众压力,或许可能好一点吧,看看!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跑到我们党内来,也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可以过关,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过不了,《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我们社会主义要经过好多阶段,推翻了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的关他过了,没收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关他过了,三反五反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反右派、公私合营、三大改造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七年反右斗争因为没有反到他头上,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九年反对彭德怀,不是直接反对他,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告诉我们,是长时间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因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可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了,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们国家是存在的,在思想这个问题上影响是很深的,不能低估,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社会主义这一个大关,很多人,相当多的人就过不了,当然,相当多也还是一小撮。(江青同志插话:七亿人口就

是有三千万也还是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陈伯达同志在中央首长接见有关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六)“现在批判陶铸……，这是对的！”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方向指正了，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指向制定反动路线的刘、邓，进一步指向继续执行反动路线的陶铸，进一步指向彭、陆、罗、杨反党集团。

.....

同志们，刚才说你们要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继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对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周总理接见农林口部分师生和人大红卫兵的讲话)

“我们北京的形势也是好得很，北京的形势，特别是在最近这一个时候，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揭露了陶铸，揭露了他继续忠实地执行刘、邓路线，揭开了这样一个盖子，这个变化特别表现在中央直属机关同宣传文教系统各个单位把陶铸的盖子一揭，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过去是一块石头压着。……现在，我们革命群众揭露了陶铸的问题，现在机关里，好多重要的机关，我们看了看，过去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现在变化了，盖子揭开了，斗争展开了。什么陶铸呀，什么熊复呀，什么大大小小的人物呀，那些继续最顽固地坚持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统统被揭露了。”

“在你们新华社搞的一套是什么东西呀？什么照片一定要把邓小平的脑袋搬到陈毅同志的身子上，就光这一条，叫做什么货色呢？很恶劣！在机关彻底批判陶铸的这一套，这对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这些机关一定能够掌握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手里，那么一些坏家伙，请他们滚！滚下台！”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王力同志在新华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关于李冠英、钱国屏、齐永冬、朱岩、刘德珍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并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要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戚本禹同志给徐昕等五同志的一封信)

(未经首长审阅，据《斗陶战报》创刊号)

(一) 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恶毒攻击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他们(指广大人民群众)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事业，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但是，又有谁敢说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比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的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还有黑点。

(《太阳的光辉》《上游》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一贯正确”(这是不可能的)，而在于他既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又能够不断地发现问题，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来改变他的措施。

(《总路线和工作方法》《上游》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

不准乱提口号，不准乱出花样，不准宣传个人，要大力地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的英雄创造。

(《关于整顿和改进不良作风的十项建议》一九六一年四月)

中国有句古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不对。什么圣人没有错误？孔夫子是几千年来的“大成至圣”，也有错误嘛！而且错误很多，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只能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难道我们没有错误。

(《中南通讯》一九六五年四月)

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很活跃，后来给孔夫子统死了，被捧到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太过分了，实际上也不见得他是先师。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在悬谈会上的讲话)

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那个人走。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歌剧话剧创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

不要把中央和主席倒提，应是中央才主席，个人作用和集体作用要正确。

(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其实讲错话是很难免的，话讲多了就会有些错误的。列宁写的文章改动很多，可见第一次写时是有错误的，毛主席的稿也一改再改，就是最初不太正确，“文不加点，一字不改”是吹牛皮的。写文章是很费力的，思考也是这样，何况说话？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对广州市中等学校校长、党支书、教师的讲话)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塌下来。

(经济困难时期的一次讲话)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提出了反右倾，庐山会议解决了彭德怀的反党问题，但全国反右倾是不恰当的。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日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要有海瑞的风格，即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风格是很高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学习这种风格。

（《广东省常委汕头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

我过去从来没有喊过毛主席万岁，今后要喊毛主席万岁啦。……

我本是剥削阶级出身，也坐过监，要吃饭到国民党那里可以找到饭吃，在共产党这里也可以找到饭吃。

（一九六三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处长级以上干部“七一”报告会上的讲话）

由于我们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全国的政权虽然是人民的政权，但政权的直接行使者是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共产党员手里，这里，就容易使我们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现在有了政权，往往就容易用行政命令办事，这样，长期习惯于坐在机关里下命令，用行政命令来办事，承上转下等因奉此久而久之，不变成官僚主义也是怪事。

最主要的就是不能脱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我们和群众关系就会不断地正确地发展；不会是过去历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的报告）

我们时代和以前的封建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从来就是要求大家来批评、来提意见，不然，我们连唐太宗能做到的事都办不到，那确有愧于伟大的共产党的称号。……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在广东省常委汕头会议（扩大）上的总结发言）

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不如封建帝王，唐明皇很尊重李太白。孙悟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在花果山闹独立王国，以后改造好了，成了正果。唐僧只会念“紧箍咒”，如果不是这办法，孙悟空可能改造得更好些、更快些，证明唐僧本领不大。

（一九六二年在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唐明皇是个封建帝王，他为了讨得一个妃子的欢心，还对李白那么尊重。现在我们是希望作家写出人民欢迎的好东西，为什么对作家不尊重呢。

（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偶语者弃市”是过去反动统治者的做法……我认为秦始皇是有一定的功劳的，不好的是他焚书坑儒。其实他坑儒也不多，不过四五百人。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广州市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领导的湖南秋收暴动三十一团……在士兵和干部中也经常发生吵架、打架的现象……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乱用稻草，拿门搭床铺，睡后又不给装上，到处拉大便等。

（同上）

有些同志不愿听别人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还由于缺乏一种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宽阔胸襟。

（《太阳的光辉》）

由于我们主观上对客观规律的局限性，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在工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除非他不工作。一个政党也是如此。

（同上文）

有些同志听不得人家的批评，看不得人家的批评文章，一听到或者看到就跳起来，说人家为什么不看到九个指头，说人家为什么否定我们的成绩……

我们的事业本身早已证明，一个指头仅只是一个指头，正如同太阳中的黑点也仅只是黑点

一样,指出来正应该欢迎,为什么要反对呢?

(《太阳的光辉》)

二、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 挥舞“庸俗化”“简单化”的大棒,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省以下各级党委和各个部门, 理论水平是不高的, ……对政治经济学就懂得不多, 更不能很好地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实际工作。因此, 有时候在工作中的盲目性就很大。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会使我们系统地了解这些道理; 这样就有可能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相反地不懂得和不会运用政治经济学, 工作缺乏理论指导, 盲目地去搞, 就常常会产生乱碰乱撞的情况……。

这是形势的需要, 同时也具备了可能的条件。……, 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识别能力, 以便更好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 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我国建设得更快更好。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十日的讲话)

宣传毛泽东思想, 不要庸俗化, 如打球也宣传。要注意只讲毛泽东思想, 不讲马列主义, 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 我们要高举马列主义大旗。……

(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什么叫做体现毛泽东思想? 只要是工农兵喜欢看, 看后认识有所提高, 就是体现了。至于演出中拿不拿毛主席著作, 挂不挂毛主席象, 不一定。

(一九六五年八月在中南区戏剧汇演时的讲话)

现在这个大队(按: 指宝安县新生大队)毛泽东思想家喻户晓, 成为“金科玉律”, 神圣不可侵犯,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谁就没有地位。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南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和尚也天天念经, 你们共产党员不也天天读毛主席著作。

(一九六五年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报头不登语录, 可以多登一条消息。

现在都是一般化, 怕困难, 就学习《愚公移山》, 一学就通了。

开会就是开个编报纸的会, 天天学毛著, 连报纸也编不好, 变得没有用。

体育报是否要办好, 晚会, 不然……你们不是晚报, 体育版比过去低了, 体育也是毛泽东思想;

不要搞得那么单调, 不要公式化;

有点知识好, 不要把突出政治简单化;

晚会要有趣味, 更不要板起面孔, 板起面孔不一定是马列主义, 文字多些风趣不一定就不是马列主义。

(一九六六年四月对羊城晚报指示)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发表新的有份量的东西。这几天日报发表多钻学习毛著的报告就是以前报导过的, 没有什么新东西。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对晚报党委的讲话)

挂主席象、念主席语录是可以的, 但不能以此为标准, 挂了毛主席象就是高标准;

我可以讲很多毛主席的话, 因为我同毛主席接触总比你们多, 但我讲话不如你们演戏, 卖

票是没有人买的。

标语口号有伟大的作用，但是不能拿来唱戏，这和戏不能拿来作标语口号是一个道理。

(一九六五年七至八月中南会演的一些讲话)

十三级以上干部以学习马、恩、列、斯著作(三十二本)为主，十三级以下干部学习毛选四卷。

(一九六四年中南局直属机关理论学习规定)

“老三篇”很简单，干部没有什么可学，主要是农民学习。干部要学习基本理论。

(一九六四年在广东花县花山公社蹲点时对四清干部的讲话)

我们不能把原子弹看成和普通的炸弹一样，把它看得狗屁不如，如果这样，那当然是阿 Q 精神的表现。

(《对三个问题的看法》，《上游》一九五八年第十期)

谈到读书，最根本的一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除此以外，还应当读点有关生产知识、技术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的书。例如《资治通鉴》就很可以读一读，……李杜之诗、苏辛之词就值得一读。诸如《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今古奇观》啦，也可以翻。外国书也可以读一点，诸如《天方夜谭》《伊索寓言》以及名家小说也可以看看。……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也是可以读的。

(《思想、感情、文采》，《上游》一九六〇年第一期)

周扬同志说得好，以自学为主，县以上机关(干部)要学十本书，马恩列斯五本，毛主席和刘少奇共五本。

干部学习要研究一下，要读读报纸、杂志，现在读书的空气不太浓了，读书中有两种偏向，一是只读书，不问工作；二是只有几本小册子，不读经典著作，基层干部文化学习要办。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陶铸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禁止出革命宝书也不亚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一九六五年十月，省委农村四清运动办公室和省委宣传部合编了一本供四清工作队员学习的《毛主席语录》，共印了三十万册，却一直被陶铸扣压不放。

这政治事件的经过是这样：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根据广大四清工作队员的迫切要求，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省委农村四清运动办公室及宣传部参照了解放军总政的版本及针对四清运动的特点而编印出《毛主席语录》一册。陶铸一见样本，就把它定为禁书，下令“全不准发”。后来，只发几本给常委，也发一本给陶铸。他一看就大怒，重下指令，“不准再发”，连参加编印的同志要求领一两本都被断然拒绝。后来是在旧中宣部压制印刷、出版毛主席著作的滔天罪行被揭发以后，迫于形势陶铸才同意发下去。

(二) 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陶铸对抗主席关于肃反问题的重要指示，美化、同情反革命分子，妄图取消阶级斗争，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大肆宣扬阶级调和论

开展坦白检举运动以来，是很紧张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反革命分子最后被消灭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必须解决几个问题》)

我们向来都是主张“先礼后兵”的。对反革命分子我们首先讲宽大，只要归向人民，为人民服务，我们还是欢迎的。这样宽大政策，若不是经过几年，而是当时(按：指解放初期)便对反革命分子予以镇压的话，那便是不教而杀，不是“先礼后兵”。但是在五年后，当人民已经给他们相当长的时期改过自新，而他们还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还在反对我们，那便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过去在我们内部不早搞肃清反革命斗争，对反革命分子来说，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等待他们，希望他们放弃其罪恶活动。

(同上文)

目前中国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不是很愉快的。他们为什么还进行反革命活动呢？我看大多数是由于被欺骗。

(同上文)

但他们毕竟还是在“自欺欺人”的境况中过日子，内心还是很矛盾的……现在有些想不做坏事，又怕得不到人民的宽大，他们思想是有矛盾的。他们会考虑到，如果他们坦白，得不到人民的宽大，他们为什么要坦白呢？他们这种顾虑、怀疑，表明他们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但他们是在矛盾之中。

(同上文)

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反复交待政策。这样，他们便会考虑要坦白得到宽大好呢？还是顽抗被镇压好呢？我想，绝大多数的反革命分子是会走前一条路的。

(同上文)

如果他们(按：指反革命分子)认为在新社会这碗饭吃不下去的话，我们可以请他们再等待一下，事实会教育他们放弃阶级成见的。

(同上文)

二、篡改、歪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积极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抹杀阶级矛盾；贩卖修正主义货色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

现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显露出来，这是一种新的情况。

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六万万人口的大家庭，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反革命分子虽然还没有完全肃清，但已经是少数了，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

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今后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用思想方法解决。

我们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了，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反革命残余已经基本肃清，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这个问题的提出，只有在阶级矛盾解决之后才能可能。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因而才有可能“齐放”和“争鸣”。假如没有阶级矛盾解决的前提，就不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阶级矛盾没有解决，地主阶级没有消灭，怎能“争”呢？能叫地主和我们“争鸣”吗？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连残余也不存在了。

随着阶级矛盾的解决和消灭，政权的专政职能要减弱，从而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调整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去。

必须使全体同志认识，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采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手段，而要巩固革命的胜利并把社会主义社会向前推进发展，则必须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对于“左”的情绪必须克服，当然右的情绪也要加以防止……就目前来说，我看还是“左”的教条主义的阻碍是主要的。

（以上均摘自陶铸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七日在省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搞敌我斗争，搞阶级斗争是有经验的，但搞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经验的。

农民和国家有矛盾，一个是国家的计划和农民的经营生产有矛盾……还有猪的价格问题，国家收购价低一些，农民不愿意卖……城乡关系间有矛盾……农民想到城里来，我们不叫他们来，他们有意见……干部作风不民主，强迫命令，有些合作社干部有贪污现象，问题不少……集体和个人有矛盾，自由市场一开放，养鸭养鸡，不愿出工；合作社限制社员搞副业，社员有意见……有些人想搞单干，有些人搞商业、小贩……（解决这些问题的）药方，（第一）搞一个大丰收，问题就基本解决了。（第二）可以允许社员搞副业。……合作社分给社员的占社员收入70%，社员家庭收入占30%，这是一个大体的标准……一个主要劳动力一年应出120个工……合作社应帮助社员搞家庭副业。

工人方面的矛盾——提高工资以后，工资更不合理了，有的太高了，要降低；太低了，可以调高一些……有些福利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房子问题……工厂管理不够民主……临时工不能转正，学徒可以毕业，但明年才能转正……地下工厂需要的可以合法，改为地上工厂……

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人民内部矛盾是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满消除，团结增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以上摘自一九五七年陶铸《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

现在情况不同了，从国内来讲，我们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所以整风运动大体告一段落后，就要更好地向自然界作斗争，要革自然界的命。

（一九五八年《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在解决了阶级关系的情况下，怎样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就变得迫切须要解决了。

（同上文）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是什么内容呢？首先是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已

过去了……现在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阶段过渡到技术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建设的竞赛，当然也不放弃军事竞赛。

(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广东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因为我们战胜了右派才彻底解决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反右派斗争最后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了消灭资产阶级的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华南师范学院的报告《我们是怎样取得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

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不仅消灭了地主阶级，而且孤立了富农。要使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合作化后工农联盟更巩固了，从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就完全丧失了。由于上述两方面的结果，中国资产阶级彻底孤立了。

(同上文)

三、吹捧、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取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我们已等待了十年，总希望能很好合作共同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所响往的只是他们过去站在人民头上屎所过的那种荒淫糜烂的寄生虫的生活，这就难怪他们对于我们的事业总是百般挑剔、万般责难了。……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封某些人的嘴巴，拒绝听某方面的意见，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共产党人最能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的，是能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并且勇敢地改正。我们批评这些人是希望他们改变立场，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为建设我们的国家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九年《胜利得来不易》)

反右派以后两条道路问题基本解决了，今后党内外应互相信赖，加强团结，同舟共济。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在恳谈会上的讲话》)

土改结束将近十年了，有些地主表现好的，已经取得了社员资格或候补社员资格，一部分人还没有取得这种资格，但在经济上还是按社员待遇。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主多数也是可以改造的。那么，改造一个，我们就团结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很多跑掉了，没有跑掉的，改造了以后，我们也要团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之后，也就是可以团结的人了；帽子还没有摘掉的，只要自己愿意改造，也有机会摘掉。至于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在广义上讲，都可以叫同志，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志。

(一九六一年九月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

(同上文)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不是一个阶级……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是革命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要做到关心别人就象关心自己一样。不要动不动就划人家右派分子。在我们这国家，讲谁是右派、反党，那他是混不下去的呵……大家都是来革命的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看，除了极少数人外，谁个不想把我们的国家搞得好，谁愿意永远贫困，谁愿意沦为殖民地的奴隶呵！

(同上文)

言为心声。强笑为欢，不是内心的话，不是真情的流露，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这能怪作家吗？当然作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还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搞得人家心情不舒畅，反过来还要求人家歌颂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有深厚感情，这也困难了。

(出处不详)

社会主义还一定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过，我们不要空谈过渡，而要扎扎实实地从生产着手，为过渡创造条件。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访问韶关市郊区樟市人民公社时的讲话)

搞农村的办法：一个叫半机械化，一个叫养猪积肥。

(一九六〇年在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

如果对人民公社还有怀疑，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再看它一两年，希望把这些话向其他上中农讲一讲，叫大家有意见就提，提什么意见都不要紧。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访问韶关市郊区樟市人民公社的讲话)

上中农和贫农、下中农都是农民兄弟，正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之间总会有意见。

(同上文)

共产主义风格不能作为普遍要求，而只能作为思想教育来讲……就是作为思想教育来说，也只是一个方面而言，作为一种思想觉悟而努力。而在党内来说，也不能提得过多，因为目前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提：只要劳动，不计报酬。

(一九六一年在省三千会议上的讲话)

(三) 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一、极尽歪曲、攻击、丑化之能事，竭力反对和企图削弱党的领导

不能随便乱扣帽子，不能象唐僧对孙悟空一样，动不动就念“紧箍咒”；再就是今后的思想斗争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只能采取交心，恳切，切磋的办法。不要搞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在中南高级知识份子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两年有些地方我们搞“左”了，有些运动搞的过了火，这不能怪下面。运动绝不应多搞，应严格。这几年运动是搞多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党执政了，就凭行政命令办事，不做群众工作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党坐轿，民主人士抬轿，抬轿的人有四个。第一个说：“扬眉吐气”；第二说：“不敢放屁”；第三个说：“昏天黑地”；第四个说：“多走半里地”。

* * * *

共产党搞工作，怎么搞法？是指手划脚，还是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如果搞的死气沉沉，教学质量降低，这是不行的，这叫包办嘛！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报告)

我们要帮助大家排除障碍，克服困难。而不是制造障碍，诸多留难。否则，我看有领导不如没有领导好。……

领导工作还有一条，就是要保证作家的工作条件。……领导不是讲空话，不是念“紧箍咒”，要解决工作的问题，给大家制造工作的条件。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要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不转到上面去反对官僚主义怎么可能？

(一九六〇年《随行纪谈》)

不关心人，不谈心，不尊重人家怎能领导，这就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力服人，不靠真理，靠压力，靠权威，靠狠，这是不成的，这样下去权力也不能长久，人家不会拥护我们。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看来中学不能让党支部领导，要实现校长领导。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这个副校长很强调支部领导学校，我告诉他支部不能领导学校(大学党委当然不同)，只能起党的监督作用和保证作用。但是，他不满意，说我取消党的领导，是朱可夫思想。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这个会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过去这些知识分子开会都是坐在角落里，这次扬眉吐气，纷纷坐到前面来。党政领导人过去都是大摇大摆坐在前面，现在却缩到后面去了。

(一九六二年在从化温泉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党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自己不察不觉，总是有那么一点“党气”。这“党气”实际就是“官气”哩。为什么有一股“党气”，就是有优越感。党员就是与众不同！就是高人一等！有了这股“党气”，我看一切领导就完了。你有“党气”呵，人民就没有“民气”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要谈谈党内党外关系问题。现在有些党员有优越感，盛气凌人，“我来领导你。”中学不少党员负责人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而党外校长是很有经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在悬谈会上的讲话）

广东有一个中学的副校长……很强调支部领导学校，我告诉他支部不能领导学校，只能保证学校任务的完成。但是，他不满意。他说我是朱可夫思想。好大的一顶帽子！难道只有他那个支部领导学校才是党来领导，教育厅党组领导，广州市委来领导就不是党的领导。说得严重点，真有点“飞扬跋扈”呵！所以我总希望，我们不要再刮秋风了，多刮一点温暖的春风吧。秋风一来，树叶尽脱，还有什么百花齐放呢？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有些单位的领导不与群众商量，少数人包办，自己外行又不懂装懂，搞不好人家有意见就整人家，对人很不尊重。“外行领导内行”是指总的政治方向，领导大家搞社会主义建设，但具体业务不是包办代替。如汽车中途抛锚了，我们只能安慰司机，鼓励他的情绪，这样就是政治领导，不能靠自己动手搞，或者开一个会，作出决议汽车非走不可，这样汽车还是不走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在悬谈会上的讲话）

根据我看，我们既没有“放”起来，也没有“鸣”起来，相反地，近几年的创作更加有些萎缩了，言路更窄了。这是不是危言耸听闻，这是不是右倾呢？不是，我看应该这样讲。为什么会这样？这和我们领导文艺工作部门的同志，不尊重创作的“所有权”，不尊重作家，瞎指挥等有很大关系。大家听过侯宝林说的相声“关公大战秦琼”吧，这段相声说韩复榘的父亲听戏的事……汉朝的关公战唐朝的秦琼！这是对一些无知的人而又乱干预别人，持权行事的人的一种讽刺，一种非常尖刻的讽刺。当然，我们的同志们不会糊涂无知到韩复榘父亲那种地步，但是，有些地方也很有点相象。要作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创作，要作家看着自己的眼色去修改，而且创造出“我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理论”，这还怎么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这还怎么能从各方面来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呢？这还怎么能表现出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呢？当然不能。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现在偏偏有些同志，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创作更是外行，但是他却偏偏热衷于发号施令，干预人家，要人家照着他们的想法来创作，来办事情……我看这是对作家的一种“虐待”。这种情况，应该立即改变。这两三年来，大家物质生活已经相当苦了，没有猪肉吃，没有烟抽，再加上精神上受“虐待”，那怎么还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呢？

（同上文）

现在有些同志年纪轻轻，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据说十一中搞了一次测验，有些老师答不出，本来答不出也不奇怪，省委一个总务处长是党员，一次政治测验共产党总书记是谁？法西斯首领是谁？他也不知道，老婆提示了他也搞错了，把总书记答成是墨索里尼。

（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在悬谈会上的讲话）

有些教师有这样的意思：“肃清反革命斗争我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心中有数，就是从共产党老搞运动不好。搞运动，思想批判，老要检讨。……这样搞，我便吃不消，受不了。”知